

昌运官史话

海淀三虎桥附近有昌运宫小区及一条昌运宫路。

昌运宫始建于明正德年间，位于今天紫竹桥东北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原曙光中学）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周边皆冠以昌运宫门牌号。

据《日下旧闻考·郊垞》记载：昌运宫初名混元灵应宫，司礼太监张永建于明正德六年（1511），位于广源闸之南，三虎桥西里许。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太监林潮重修，竣工后更名为昌运宫。增置垣墉二百余丈，门庑百余间，殿宇七重，松栝二十三株，柏二十株，大皆合围，夹以杂树，上枝干霄下阴蔽地，有二碑筑亭覆之，一为敕建碑，一为大学士李东阳撰文、杨廷和书、英国公张懋懋额，为正德七年（1512）立，又一碑万历中立，副使刘效祖撰文。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奉敕重修，门内天元圣境，有钟鼓楼、功曹殿，中为元天玉虚宝殿，恭

悬御书额曰：坎德尊严，联曰：气合冲虚尊水府，灵昭赫奕肃星纲；后为神霄延寿宝殿，额曰：元虚至德，联曰：真宰无言神鼓荡，元机莫赞妙生成；最后为玉霄上穹宝殿，联曰：绛阙云扶开跌宕，紫垣河绕引灵长。“前后殿阙俨如天上神，皆铜像，渗以黄金炉鼎文，发丹碧苍松翠柏，并成大观”。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记：“略国朝之制，道院多以观名，其名官者，特为隆重”，可见昌运宫在明之显赫位置。宫墙外有明武宗时八虎之一张永墓。“有明正德多权珣，永也差比彬瑾强。所知尚有几希良，依松造墓深埋藏”，这是清工部侍郎阮元对八虎咏诗评价。明正德年间，东宫的随侍太监以刘瑾为首，张永、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八太监号称“八虎”。张永参与诛杀太监刘瑾，结束了八虎时代；他还曾保护明代著名的思想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使其得以免遭陷害。

“玄宫东瞰皇畿迥，碧水西漾汉甸斜”，昌运宫临高粱河，风景优美，其中特以松柏著名，清著名诗人

法式善、弘晓、宝廷等皆有关于昌运宫咏松的华彩诗句。阮元《昌运宫白皮松歌》中的诗句最为精彩：“白龙乱窜千条光，鳞鬣欲动冷忽僵。森然结夏堆雪霜，阴羽鹤鹤飞来凉。仙人望以琼瑶浆，十步之外闻古香。手扞其肤臆若肪，俯视桧柏翻老苍。”杨大鹤《昌运宫道院看松歌》对白皮松树干、树枝、树叶、树皮等进行细致精彩的描述：“传闻琳官松最古，入门离立苍髯迎。虬枝修干互盘矗，霜皮黛叶纷纵横。干如劈华耸云表，枝如翔凤垂绶纓。叶如仙人散绿发，皮如积雪铺青苹。一株两株已奇绝，何况二十四树罗。瑶榭空阶无尘醜，坛静浓阴满地心。神堂枝头谩谩幽，籁发耳畔彷彿闻。”

清初康熙年间昌运宫白皮松仍有24株，清中期约道光时期“古松七株百尺长”，清末同治年只余“阶前四株松”。

松柏沧桑，琳宫沧桑，昌运宫名称保留至今，是对历史的纪念。

（董军梅）

“瓦塑屋脊 当承文明——燕国瓦当艺术展”在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出

8月30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主办，古陶文明博物馆协办的“瓦塑屋脊当承文明——燕国瓦当艺术展”在西周馆二楼临展厅开幕。本次展览的展品以古陶文明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燕瓦当为主，通过瓦当实物及展板文字资料，为

观众讲述燕国宫殿建筑的艺术文化成就。

瓦当在当今社会的很多建筑物上已难觅踪影，不被普通大众所熟知，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展览以“燕瓦当由来”“走近燕瓦当”“神秘饕餮——燕瓦当的母题纹饰”及“瓦当题拓赏析”四个部分为观众层层揭开燕国瓦当的神秘面纱。在策展的过程中发现，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学术性很强的燕国瓦当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说明白，是摆在策展人面前的一大难题。因此我们对本展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勾画建筑物、瓦当的线条图，并将燕国瓦当当面的主题纹饰饕餮纹各部分进行着色区分，帮助观众更加形象直观地认



饕餮纹大瓦当

识和了解燕瓦当及当面的纹饰。

本次展览，我们精心选取了62件战国时期的燕瓦当，透过这些展品，我们可以看到燕国瓦当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明显，纹饰种类多样、文化内涵深厚、制作工艺精美、青铜气息浓郁，

为学术界所关注，与齐、秦瓦当并称为我国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三千年历史回眸，古老而神秘的燕国，有太多需要我们解开的历史谜团。而有着整齐划一规制和丰富多样纹饰的瓦当成为了我们本次展览关注的对象，它就像一把打开燕国之门的钥匙，带我们走进燕国，去感受那段历史的灿烂辉煌。

（文字：黄祖冉；图片：李亮）



展厅一角

掀开白银时代的神秘面纱——学术论著写作研修系列讲座第六讲成功举办

历史学是认识古代社会的钥匙，文博行业重视历史学研究，掌握史学新成果、新理论，可以帮助业界更加深入地开展业务工作。

我国的白银时代是从明代开始，到1935年废除银本位制而宣告结束的。白银时代是如何开启的？白银货币化又是怎样在我国发展演变的？8月22日，中国社科院历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明史专家万明先生，应邀为市文物局机关、局属单位及在京博物馆从业人员开展了题为“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500年白银时代的开端”的主题讲座，解读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与明代白银货币化。

明代白银货币化发生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当时中国通过白银和世界联系，并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明先生指出，白银的货币化是从赋役折银开始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大量的民间交易促成张居正财政体制改革得以实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又加快明代中国市场与全球产生互动，导致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外银大量流入中国，形成了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性贸易网络。随着全球白银不断流入中国，晚明时期我国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而这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17世纪30—40年代，欧洲爆发了猛烈的“价格革命”。这场由白银引发的世界危机，导致了我国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市场一片萧条。同时，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影响了我国白银流入量。所以，白银输入的锐减是明朝统治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讲座中，万明先生还和参加讲座人员探讨了中国

官方银矿的开采等学术命题。

局属单位的文物研究、历史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等专业方向的业务人员参加了讲座，深感大受启发。大家认为讲座纠正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或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对今后的研究、展览、社会教育等方面工作的提升和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讲座有利于通过挖掘细微且具现实意义的历史选题，参与社会发展，指导文博工作，有利于推动文博领域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博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讲座指导单位：组织宣传处、法制处（科研处）、局机关党委；供稿：《北京文博》编辑部、北京市文物局史志办公室、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7—L0023号
◆2017年第4期（总第252期）
◆2017年8月31日印刷
◆印数：2000份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8月26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牵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市文物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主持。随后又召开了由北京市文物局牵头的长城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议，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主持了会议。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国土委、市交通委、市农委、市水务局、市旅游委、市园林绿化局、市法制办、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区政府、区文化委员会、区园林绿化局的领导及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并宣布成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小组、长城文化带建设专项小组。会上宣读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组工作规则》《长城文化带建设组工

作规则》。

之后，于平副局长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以下三点意见：一是认真学习，提高认识。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有关讲话。北京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首都文化建设，思考认识文化建设的意义与价值。二是明确分工，抓好落实。各成员单位要认真研究文化带建设工作中涉及到的相关政策，结合各自职责、职能和优势，积极参与，也要明确职责，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人员。三是统筹安排，加强协作。各成员单位要把北京文化带建设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政治任务和重点工

作。之后，于平副局长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以下三点意见：一是认真学习，提高认识。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有关讲话。北京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首都文化建设，思考认识文化建设的意义与价值。二是明确分工，抓好落实。各成员单位要认真研究文化带建设工作中涉及到的相关政策，结合各自职责、职能和优势，积极参与，也要明确职责，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人员。三是统筹安排，加强协作。各成员单位要把北京文化带建设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政治任务和重点工



市文物局于平副局长主持长城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会议

北京市文物局召开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座谈会

8月3日，市文物局邀请部分区分区文委和博物馆负责同志在局机关新会议室召开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座谈会，于平副局长主持。

博物馆处范军处长介绍了我局召开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座谈会的缘由：一是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国务院《博物馆条例》；二是为贯彻2017年全市文物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简政放权的总体思路及“放管服”改革的总体要求，计划分步推进各区落实博物馆属地管理职能；三是为听取各参委会单位对建立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博物馆处李学军调研员对我局拟发的《关于建立市区两级共管机制切实落实博物馆属地管理职责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作了介绍，对涉及各区文委具体落实博物馆属地管理职责的相关内容作了重点解读。

参会单位负责同志依次发言，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我局建立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很必要、很及时，有利于区域内博物馆事业发展与全市博物馆的规范化管理。同时，对《通知》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涵盖日常工作交流、区域性行业组织发展和政策资金项目扶植等方面，也对我局的博物馆管理工作提出了增强工作交流和业务指导力度的建议。

法制处李响同志系统梳理了我局建立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的法律法规依据，回答了部分参委会同志的疑问。

于平副局长作总结发言，感谢参会单位对我局工作的支持，再次强调此次座谈会的大背景是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国务院



《博物馆条例》。作为我局建立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的前奏，也是依法落实博物馆属地管理职责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局将在听取与会单位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结合全市博物馆行业实际情况及各区文化委员会专业管理队伍现状，分步推进各区博物馆落实属地管理职能。

（市文物局博物馆处）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对京西大宫山的调查

在海淀区苏家坨镇大工村有一通石碑，文物普查登记项目记为“园寝重地，禁止樵采”碑。此碑碑阳书“宣统壬戌五月，园寝重地，禁止樵采”。碑阴书“洵贝勒府庄园处奉谕：著庄园处传知本府园头黄文岐、黄国臣、杨森，所有大宫山玄同寺沟一带相连山产，均划归本爵预修吉地之用，统名之曰九龙山，栽安界桩，以符赐恩原旨名称。所有伊等出力垦“园寝重地 禁止樵采”碑（岳升阳摄）



“园寝重地 禁止樵采”碑（岳升阳摄）

熟山地，侯占用时另行酌量给价，俾资移种，而示体恤。将此通报知之。特谕。”

所谓宣统壬戌为1922年，当时逊清朝廷尚尊奉宣统年号。洵贝勒就是光绪皇帝之弟，溥仪之叔载洵。大宫山也就是今大工村一带。1924年，载洵拟拆除大宫山的玄同宝塔，因为涉及古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载洵的拆除行动没有成功。

对于大宫山的古迹，当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院及考古学会极其关注，先后两次派人调查，并在1924年8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布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及1924年上半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院派顾颉刚和容庚探访大宫，并写有报告。而后由于有人在大宫附近乱掘（即指载洵拆塔事），宛平县官方通知北大研究所，研究所考古学会本着保存古迹的原则，拟调查并发掘，并派出徐炳昶与李宗侗二人再度调查。徐、李二人在大宫见到“御赐洵贝勒府九龙山地东界”石桩、“宣统壬戌年立”碑（即禁止樵采碑）、玄同宝塔。在玄同宝塔上二人看到宛平县知事

所出“禁人毁伤古迹”告示。对于玄同宝塔、周边房屋遗址及二石洞（应即排水涵洞），二人都有直观描述。离开大宫后，徐炳昶和李宗侗又调查了周云端和高塔及辛庄黑楼。对于调查所得及与传说的关系，二人做了合理推测，指出大宫可能为刘瑾的房屋园寝，后废为寺，石洞就是刘瑾房屋的遗品；对于黑楼，二人认为可能也与刘瑾有关；而玄同宝塔他们认为与刘瑾无关，推测为和尚坟。基于调查，报告提出了三步发掘计划。同年8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发了《研究所国学院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文中指出古物古迹的重要性及国人对于古物古迹的轻视，并将矛头直指清室，最后呼吁“苟国人不急起阻止，则今日失一古迹，异日即失一史料，其事似微，而所关兹大，长此以往，西山古建筑将积渐受其摧残，史料缺逸，后来学子，考索无从，我国文化将有沦亡之惧，不亦悲哉。本会有志考古，无力挽救，瞻企文化，怒焉兴忧，所望邦人君子，群起力争，则庆幸者，非徒考古界矣。”

当日调查大宫古迹的四人，顾颉刚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开创了国民俗学及历史地理学，容庚则是古文字学家，徐炳昶（旭生）为考古学家，李宗侗也为历史学家。以我们今天后知后觉的眼光看他们的调查结论是有问题的。玄同宝塔之北的墓葬在1960年修建水库时，得知其墓葬主人为高时明，也就是玄同宝塔的建造者，大宫古迹与刘瑾无涉，是高时明所建园寝道观。高时明葬于九龙山之事见于刘若愚《酌中志》及孙奇逢《司礼监掌印云峰高公墓表》（《夏峰先生集》卷十）。此外王源《居业堂文集》卷



高时明墓（田海摄）



高时明墓内景（张鹏飞摄）

二有《司礼监高时明传》。

虽然具体调查结论有问题，但调查者所秉持的实地调查及科学发掘的理念是我们至今都应该学习的。今天看来，当年北京大学诸公保存古迹的初衷还是实现了。高时明墓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他们看到的两石洞今天称大工村北花园排水涵洞，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就连他们当日看到的“禁止樵采”碑也成了文物，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张鹏飞）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查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宜，图文并茂，并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为：bjjwzb2005@126.com

特别说明：2016年2月，《北京文物》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订阅号“北京文物报”。自2016年3月1日起，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陶然亭公园出土石龙头年代考

2009年2月，北京陶然亭公园东南部地下电缆施工时发现了一件巨型石雕，由于没有完全出离地面，尚无法准确测量其规格尺寸。目测大约长130厘米，宽100厘米，厚80厘米。偏白色的大理石质地，圆雕方法，质量大约在2千公斤左右。它的出土很可能与陶然亭公园一带的历史有关，它具体的出土地点在公园东南角，正好位于历史上原黑龙潭的范围。文献所记载的黑龙潭井眼位置距此东北约60米处，现在正好是一处宾馆饭店的北门口。传说黑龙潭中有一条黑色的恶龙，仙人将其制服，用长长的铁链拴住，就压在这眼古井里。新中国成立后，有人看到这口古井还有两米多深呢。再后来，盖建其他建筑时，为了地基的牢固，还做了特殊的处理，专门用一根很大的水泥梁横在了上面，也许是担心恶龙跑出来吧！

陶然亭历史上尚有更多的文献记载，因苦于没有实物，无法得到证实。此巨型龙首石雕的发现对解开这些谜团会有些帮助，有以下几条原因：

1. 经过查证史料，以及向老人们了解，虽然大家都不能准确地

划出原黑龙潭的四至轮廓，但可以肯定的是文物出土的位置就是在原黑龙潭的范围，说明它与黑龙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 文物本身的选材、体量、刀工、造型等特点，足以说明它是盛世或帝王非常重视之下的产物，绝非普通民间、民俗、宗教等活动之物。

3. 文物本身无任何擦划、断裂等硬伤或严重风化痕迹，说明它废弃之后未曾挪移过，这就排除了它被二次搬运的可能，也即有人说它是天坛、先农坛移来之物是不太可能的。

4. 文献记载清初黑龙潭的盛况，却未曾提及此龙首雕，说明当时虽然有亭、有潭，但不必得见此巨龙。设想如果当时人们倘能见到它的尊容，文人学士们会轻易饶过它吗？文学作品诗文中能少得了对它的赞美和描述吗？

5. 与现存明清石雕石刻相比，此龙雕石质不仅细腻适刀，而且莹洁滑润，水头十足，几乎没有风化，其材质相当优秀，其历史必当久远，属于北京或河北地区所产“燕石”的“老坑”料。即便是今天偶然出土的元代石雕石刻，我们都会发现其表面并没有那么多的风化、剥蚀等情况，这说明近千年前的石材开掘尚处于初期阶段，生态保存良好，水分饱和，相当于玉石中的“籽料”。

6. 此龙形石雕设计大胆，造型奇特，用料大，刀工流畅，毫无滞碍，不具楞角，与今存同类石雕如吸水兽、螭头、桥头兽、龟跌首相比，有明显的

差异，而今同类石雕又大多为明清之物。反推的话，它的时代也应在明清之前。

7. 元代虽非盛世，但到元末，英宗、天顺帝荒淫奢侈，举国之力而毕于玩乐之役，雕龙祈雨，不是没有可能。元代是马背民族，设计、制作不受什么框范，也没有那么多礼节、宗法的规定。龙首石雕的特点，符合元代风格，也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据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载：“元祖肇建内殿，”“槛与阶皆白玉石为之。”“九龙蟠，龙形九曲，金辇玉蟒绕罗亭。”“又有龙泉井，玛瑙石为井床，雨花台石为井漱，香檀为盖，摘朱锦为索，云母石为汲瓶。”“熊嫉性耐寒，尝于月夜游梨花亭。露袒坐紫斑石，元帝见其身与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联缟亭。”“（顺帝）每遇上巳日，令诸嫔妃被于内园迎祥亭、缥碧池。池用纹石为质，以宝石镂成。”“池中又置温玉浚窠、白晶鹿、红石马等物，嫔妃浴澡之余，则骑以为戏。”所以，此物出于元代是有理由的。

8. 北京今尚存能参照的元代石雕，有白塔寺、房山岩上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海公园的塌腰狮子、角兽、溱山大玉海等，相互比较，不难看出它们有相似之处。

9. 此石雕成品体量很大，推算当时所采荒料即应在三个立方米以上，这样大型的工程，仅仅是民间或者宗教信仰，恐怕是很难达到的，所以不论其为何代之物，必为皇家无疑。而且元代无论是石雕还是玉雕，都十分推崇大气圆润的风格，出土的这尊龙头恰恰也符合这个特点。

10. 龙为抽象之物，但雕龙确需具象手法，此龙雕周身不论何处无一废刀败笔。除了表现其流畅、庞大、神灵之外，到处都有仿生、符号、寓意的应用。比如它的眼睛圆瞪亦龙亦狮，龙口微张舌面屈曲似吟非啸，龙鼻写实夸张有如灵芝瑞草，龙角双歧似鹿如鳄，须发髭鬃卷曲缭绕而颇多韵致等。

11. 龙雕的某些部位至今仍依稀可见其石绿矿物颜料着彩的痕迹，但未见朱砂之色，可能另有原因。

一般来讲，着色的石雕作品常常会有两种基本颜色，一个是绿彩，一个是红彩；红彩是朱砂色，绿彩是石绿色，均为矿物质颜料。朱砂色应该在龙头的眼珠子上，标志着这个作品完成了，这就像耍狮耍龙要点睛一样。而这个龙头，根本就没有上点睛之笔。也许有人会说这上面的红彩失掉了，可是又为

什么这么大量的绿彩留下了，偏偏红彩一点都没有留下呢？这就说明当时它并未雕完，也没真正启用。

12. 既然是龙首石雕，它会不会是一件像卢沟桥等的那种吸水兽、镇水兽呢？如果作为吸水兽放在桥孔券脸的正中，那么这个桥至少要比卢沟桥的中孔大得多，从形制、形式上看也不大可能。如果像

广源闸桥镶嵌嵌岸的兽头，相比来讲此兽头也显大了点儿！那么，龙头之后是否还有龙身呢？此头如此巨大，其身之长、之巨即可想而知了。我们观察龙首的后部为斧刹出的平面，居中凿以方孔作为穿榫。在龙首的下部仅有20厘米左右环刻的龙鳞，据此可以推断这仅仅是一部分过渡的龙鳞，其后尚应有龙鳞龙身的衔接，但其长短不可知，其造型不可知，

其存否不知，是行龙、坐龙、走龙还是盘龙，不可知。

13. 龙头如何使用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龙头的底部与两颌下面均为斧刹平面，尤其是后者，肯定需要与其他平面相附着，故其独立竖于潭池内昂头吐水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它居高临下，颚下贴墙，张口吐

水。龙头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孔，一直通到前面的舌头，就像人和动物的嗓子眼儿（喉咙）。可以想见，这样的设计，不单是为了美观，很可能还具有实用价值，它的作用就是过水用的，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排水或喷水的设施。

14. 龙头是喷水还是吐水也是个问题，并眼就在距此约60米处，说明水源不成问题。但龙口开度约50厘米×20厘米，在没有电力泵水设施的古代，哪里能供应那么大的水量呢？或许是仅仅在大型活动时蓄足水量一用而已！

15. 从表面没有硬伤及风化伤来看，龙首似乎未经使用即遇变故掩埋了；从其着彩而没有丹砂痕迹来看，似乎工未完也未点龙睛；从其吐舌过水而未留水痕来看，它根本就没使用过。

16. 龙头出土于地下约1米处，的确不够深，但并不能说它年代很近。因为此处在古代不会有太多的居民，故生活垃圾较少；另外龙头如果设于高处，弃置之后自然就不会深埋了。又经过若干年，就是数百近千年，生活垃圾再少也足以埋过石龙了。

总之，此巨型圆雕石龙之首，应系元代末年帝王下令出资并安排优秀的工匠们雕凿的非常优秀的时代艺术作品，它体现了当时工匠们的水平和当时的社会时尚与设计思路。元朝统治中国的历史，仅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蒙古民族虽然汉文化的水平不高，但其手工艺水平却非常高超惊人，这从至今犹能于博物馆或民间看到的出土或传世的玉雕器物身上即可反映出来。龙首雕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元代在今陶然亭公园范围内建潭的史实。频繁的改朝换代，让许多当时的雕塑作品都还没来得及完成，就被遗弃一旁了。所以，龙首石雕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城市雕塑，就放在黑龙潭的中心。而且，它还是用洁白玉雕的巨龙，正好也起到了镇压黑龙潭中黑龙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黑龙潭，著名的实际上有三处：其一是密云黑龙潭，位于石城乡鹿皮关以北；其二是海淀黑龙潭，位于海淀区黑龙潭路附近；其三就是陶然亭的黑龙潭。而历史最为久远的当属陶然亭中的黑龙潭，有记载称可以追溯到元代。然而这个说法却一直缺少物证。这次龙头的出土，说明元代黑龙潭确实存在并且就在陶然亭附近。

（刘卫东）

邓荣贵附葬田义墓

1998年在清理整修田义墓寿域时，于慈有芳墓之前方出土了一座“清故畅春园总管韦荣贵邓公之墓”的石额，从而证实了邓荣贵是附葬在明代田义墓园中的清代宦官。邓荣贵是清代什么时期的太监呢？在历史上又有什么记载？

明代田义在模式口村西的墓园也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宦官墓园，田义墓已经成为了模式口一带非常有特色的古代建筑。田义死后，不断有明清的太监自愿附葬在其左右，从老照片来看，田义墓园内松柏参天，各种不同时期的石五供、石碑、宝顶鳞次栉比。邓荣贵是清乾隆时的太监，一生仰慕田义，他在生前就曾从慈有芳手中购得了慈祥庵的房屋在此居住，他也说过：“磨石口是一个千年吉地，田公所葬之处，暗合风水，宜置佳城，吾愿终身追随其左右。”

我们就从这块出土的石额说起。石额上刻邓荣贵是畅春园的太监总管。康熙十六年（1677）设立敬事房，隶属内务府，从此敬事房成为清代唯一的宦官机构。敬事房除管理禁内宦官，负责杂务，传宣谕旨外，还管理包括禁中之外的景山、南府、瀛台及位于郊外的圆明园兼长春园、静寄山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处。

从清代宦官的品级职衔来说，可分为大总管、

总管、副总管、首领、副首领和一般太监六级。总管和首都都属于上层宦官，他们分别执掌各处的宦官机构，其地位较高。清初的宦官不设官阶品级，顺治初年曾按规定给宦官十三衙门定过品级。敬事房是清代宦官的“宫殿监办事处”。敬事房设有总管、副总管，给太和、中和、保和、文华四殿三作首领太监员数，给与八品职衔。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式规定敬事房设五品总管一人，五品太监三人，六品太监二人。所以《清史稿》称：“（清）太监授职官自此始。”

敬事房所管辖的畅春园设有总管二员，俱七品，执守侍；首领十名，无品级；太监四十名，专司本园一应杂务。从石刻文看，邓荣贵是畅春园的两名总管太监之一，按规定品级为七品。

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六十大寿。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乾隆六十大寿自然又与其他年份生日不同，朝廷上下都在准备盛大的贺庆典礼，乾隆皇帝也回想起自己自即位以来的丰功伟绩：平准格尔、扫大小金川，河宴海清，不由得踌躇满志，好不惬意。他正陶醉在自己的光环之中时，忽然总管王忠来报：“总管潘风病故。”乾隆闻听内心颇感晦气，他强忍住怒气不发，传谕道：“潘风病故亦当俟过万寿月，发报具奏，著将王忠议罪，再总管等近来渐无忌惮，嗣后凡遇此等事件，毋得于万寿月妄行具奏。”

乾隆毕竟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对此事的处理还留有余地，他只是觉得这些太监近来有些张狂，肆无忌惮，不顾人之常情，不懂礼数，是需要严肃整治一

下，以期引起宦官们的警觉。所以他在谕旨中提醒太监们今后凡再遇到此等事情，不要再在万寿节时随便来奏。

可无独有偶，第二天，在万寿节庆典刚刚结束，乾隆接受了群臣拜贺，君臣同乐之后，沐浴更衣，刚回到养心殿，还沉浸在寿宴的喜悦中，忽然，又有总管李文贵来报：“畅春园总管邓荣贵病故。”邓荣贵连死都死得不是时候，看来李文贵还不知道昨日王忠受斥之事，或者是谕旨尚未传达，李文贵撞到枪口上来了。话音未落，乾隆心中猛然腾起了一股怒火，恶从胸中生，自然产生了一种旧账、新账一起算的念头，面对李文贵，他怒不可遏，道：“今岁系（朕）六旬大寿，太监总管病故，何关紧要，李文贵不知尊卑大体，况伊在养心殿当差多年，何事不谏，今乃糊涂若此。”

此事也不怪乾隆会勃然大怒，昨日刚治了王忠，今日又有李文贵重蹈覆辙。谕旨说得也很清楚，李文贵在皇帝身边已有多年，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想必他也很清楚，否则早就该革职了，看来李文贵也是应了乾隆的话“渐无忌惮”，连尊卑大体都不懂了，所以乾隆立即“著王常贵问明（事体），（对李文贵）从重治罪”。

乾隆并未把气撒在死去的邓荣贵的身上，只是大大地治了李文贵的罪，对邓荣贵还算宽容，说邓荣贵多年来勤勤恳恳服侍皇帝，尤为辛苦，应以厚葬。所以他才能顺利地入葬在前明太监田义的墓园中。

（陈康）